

## 《左传》叙事与解经语不合的原因及其影响

吴秉坤

(黄山学院 徽州文化研究所,安徽 黄山 245041)

**摘要:**《左传》叙事与解经语不相协和是一个关系到《左传》是否传《春秋》的重要问题,故争论双方都对这种不合的原因做出了不同的解释,无法达成共识。绕开《左传》是否传《春秋》的问题,从比较中立的立场出发,《左传》叙事与解经语不合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左传》叙事既有解释经义的功能,又有表达叙事者自身历史认识与评价的功能,超出了“春秋大义”的限定,从而导致《左传》叙事与解经语之间存在张力与不合,并使得《左传》叙事在后世义理的标准下遭到严厉批评和质疑。

**关键词:**《春秋》;《左传》;叙事;解经语

**中图分类号:**K225.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7X(2008)06-0062-05

关于《左传》历来存在很多争议,虽然司马迁在其《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sup>[1]卷十四</sup>但自汉代刘歆为《左传》争立学官以来,关于《左传》的作者及其与《春秋》的关系,却始终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特别是清代刘逢禄、康有为等今文经学者重提今古文之争以来,《左传》再次成为争论的焦点,各家围绕着《左传》的作者、真伪、成书年代及其与《春秋》的关系展开不断的争论,时至今日也未能达成共识。

在这些争论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左传》叙事部分与解经语存在不合的现象。即在《左传》中有不少直接解释《春秋》经文大义的解经语,这些解经语是联系《左传》叙事与《春秋》经文的重要因素,晋代杜预将之提炼为“凡例”和“变例”,由此建立《左传》的解经体系,确立《左传》的解经地位。但是这些解经语,特别是“凡例”,与《左传》叙事部分存在许多不合的现象。试举一例如下:

宣公四年经“夏,六月,乙酉,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sup>[2]卷二十一</sup>《左传》解经语云:“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sup>[2]卷二十一</sup>

杜预对《左传》解经语所理解的《春秋》弑君书法之义解释道:“称君者惟书君名,而称国、称人以弑,言众之所共绝也。称臣者,谓书弑者之名,以垂来世,终为不义,而不可赦也。”<sup>[2]卷二十一</sup>

即《左传》的解经语对《春秋》弑君书法之义的理解是,凡明确记载弑君者之名氏,《春秋》书法之义主于罪责弑君者,是为乱臣贼子;反之,若未书弑君者之名,只称某“国”或某“国人”弑其君,《春秋》书法之义主于罪责君之昏庸无道,为国人所共弃。

当然,《左传》所谓“君无道”,并不一定就认为弑君之人无罪。《左传》虽然一方面宣称“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sup>[2]卷三十一</sup>但另一方面还是承认“君讨臣,谁敢仇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将谁仇?”<sup>[2]卷五十四</sup>所以,《左传》所谓“君无道”之说,只是认为《春秋》书法有罪昏君之义,以为后人君之警戒。

那么,《左传》关于弑君的叙事与弑君凡例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按常理,二者既为一共同体,其义必相一致。若《春秋》书法为称臣名以弑君,按《左传》弑君凡例,此处乃责斥臣子弑君之罪,《左传》关于此事的叙事就应该相应地凸显臣子弑君之罪;若

收稿日期:2008-03-13

作者简介:吴秉坤(1981-),安徽歙县人,黄山学院徽州文化研究所实习研究员,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思想史。

《春秋》书法为称国人或称国以弑君,按《左传》弑君凡例,此处乃罪责国君无道之过,《左传》关于此事的叙事也应该相应地彰显国君无道失民之行为。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如有关陈灵公之被弑,《春秋》宣公十年,“癸巳,陈夏徵舒弑其君平国。”<sup>[12]212</sup>按《左传》弑君凡例,“称臣,臣之罪”,则《左传》解经语认为此处《春秋》之义主要在于贬斥弑君之贼夏徵舒。因此,《左传》关于此事的叙述,也应该昭示夏徵舒弑君乱国之罪。然而,《左传》之叙事对夏徵舒之罪不置一评,却着重记载了陈灵公的荒淫无道,拒谏杀忠。

“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袪服,以戏于朝。泄冶谏曰:‘公卿宣淫,民无效焉,且闻不令。君其纳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请杀之,公弗禁,遂杀泄冶。……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饮酒于夏氏。公谓行父曰:‘徵舒似汝。’对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厩射而杀之。”<sup>[12]212</sup>

《左传》之叙事揭露了陈灵公作为一国之主,居然与大臣共通夏姬,以夏姬之内衣戏于朝廷之上,并且杀害直言进谏者泄冶,最终导致夏姬之子徵舒羞愤而射杀之。由此可见,《左传》之叙事倾向为,由于陈灵公自己的荒淫无耻、拒谏杀忠,才遭杀身之祸,这就与《左传》解经语的“臣之罪”不相吻合。

也正由于《左传》叙事部分对陈灵公的讽刺态度很明显,杜预在注中只好以“灵公恶不加民,故称臣以弑”<sup>[12]212</sup>来自圆其说。宋代学者胡安国就认为杜预这种解释过于勉强,“以为罪不及民,故称大夫以弑者,非经意矣”,<sup>[13]17</sup>并且受《左传》叙事之影响,也认为陈灵公是无道之君,此处不应该称臣以弑。所以他提供一种解释,认为《春秋》此处书法之所以称臣以弑其君,只是为了见泄冶忠言之验,灵公拒谏之非。

而宋代学者赵鹏飞也认识到这种矛盾的不合之处,提供了另一种解释,认为夏徵舒虽然是激于陈灵公之无道而杀之,但却使得其母的奸情公布于天下,不符合人子之孝道,故此处《春秋》书夏徵舒之名,是为了警戒后世人子为子之道。

胡安国与赵鹏飞对于此处《春秋》弑君书法之理解虽然不同,但他们都意识到《左传》叙事所表达的思想与《左传》弑君凡例所阐发的《春秋》大义之间不相吻合,并由此而批评《左传》的凡例有误,而他们自己所提出的解释,很明显是受《左传》

叙事之影响。

由此可见,《左传》中叙事与解经语之间并非是一种完全的相辅相成关系,在很多情况下,叙事具有解经之外的独立思想价值和倾向。

因此,很多认为《左传》原是独立史著的学者,往往会强调《左传》叙事部分与解经之语的不合,认为解经之语乃后世学者所添加。如清代的刘逢禄在其《左氏春秋考证》中认为,今天所见《左传》中的解经之语出于汉代刘歆之附益,《左传》之原型本与《春秋》无关,其材料编排方式与今日之《左传》有很大区别。<sup>①</sup>康有为则发挥其说,在其《新学伪经考》中明确认定《左传》乃刘歆割裂《国语》而成。<sup>②</sup>虽然他们的说法由于门户之见而过于武断,遭到很多学者的批判。但是刘逢禄等所强调的《左传》叙事部分与解经之语的不合,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故而清代陈澧虽坚持《左传》乃《春秋》之传,却也承认解经之语多有后人附益之处。<sup>③</sup>而胡念贻与赵光贤虽对刘歆伪作说、割裂《国语》说加以驳斥,但也认为《左传》解经之语为后人所添加,今天的《左传》乃战国至汉代之人改编而成,《左传》之叙事部分原本有其独立的价值意义。<sup>④</sup>胡念贻并在其《左传叙事的倾向性》一文中,专门探讨了《左传》叙事自身的思想价值。<sup>⑤</sup>

但《左传》叙事与解经之语的不合却也并不能完全证明《左传》原是独立的叙事史书,杨向奎就认为《左传》叙事虽与解经之语存在一些不相吻合之处,但这并非是由于解经之语为后人窜加,而是由于两者的来源不同,一者来源于各国策书旧文,一者来源于当时之礼俗禁忌,在《左传》撰述之初就存在这种不相协和之处。<sup>⑥</sup>这一思路在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和赵伯雄《春秋学史》中得到认可和发挥,如赵伯雄认为:“左氏在编撰《左传》时,面对着的是各国的各类史册以及其他各种类型的历史资料,左氏一般是片断地摘取这些现成的材料,然后把它们按时间顺序编排连缀起来。左氏自己,可能做了一些文字上的加工,但没有进行多少创作。也就是说,《左传》主要是‘编’出来的,而不是‘作’出来的。”<sup>[14]</sup>故而解经语往往就会显得与记事文字不相协调,给人以割断文气、强行嵌入的感觉。同时很多学者对《左传》叙事的解经意义做了进一步分析,如杨伯峻认为,离开《左传》的叙事,《春秋》经文无法理解;同时,离开《春秋》经文,《左传》的许多叙事也无法理解,《左传》叙事并不是完全独立

的。<sup>⑧</sup>而赵生群的《〈春秋〉经传研究》和张素卿的《叙事与解释：〈左传〉经解研究》则对《左传》叙事的解经意义做了比较翔实的论证分析。<sup>⑨</sup>

因此，《左传》叙事与解经语的不相协和，并不能直接说明《左传》与《春秋》的关系，或者说，不能从《左传》是否传《春秋》这个传统视角来解释这种不相协和。《左传》叙事与解经语之间所以存在不合，可能与《左传》叙事的双重意义有关。

所谓叙事，是指“叙述事迹之始终本末以表现其发展脉络的一种文体”。<sup>⑩</sup>这种文体可以依据事实，撰述历史人物之行事，可称之为“历史的叙事”，比如史书；也可脱离现实，发挥想象的空间，凭空杜撰，可称之为“虚构的叙事”，比如小说。<sup>⑪</sup>

《左传》的叙事，就其内容而言，可以说兼具二者。就前者而言，《左传》记载了大量春秋时代的历史人物与事件；就后者而言，《左传》的卜筮预言多能应验，故唐代赵匡批评曰：“左氏所记，以一言一行定其祸福，皆验若符契，如此之类，继踵比肩，纵不悉妄，妄必多矣”。<sup>⑫</sup>特别是《左传》记载的私下言谈、密室暗语更令人怀疑，故钱钟书先生就认为：“盖非记言也，乃代言也。……左氏设身处地，佯傍性格身份，假之喉舌，想当然耳”。<sup>⑬</sup>

而且在《左传》中，这种“历史的叙事”与“虚构的叙事”往往是相互交融的，故孙绿怡在其《左传与中国古典小说》中认为：“左传长于将史实的记录与神话传说、历史传闻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凭借作者自身的感受和想象，使历史记叙故事化”。<sup>⑭</sup>

就《左传》叙事的功能而言，由于具有解释经义的意义，故又可称之为“解释的叙事”，<sup>⑮</sup>即“叙事以解经”。可以说，《左传》是通过“历史的叙事”与“虚构的叙事”两种方式相结合的方法来达到其“解释”的目的。<sup>⑯</sup>

然而，这并不是《左传》叙事的唯一功能与意义。虽然《左传》叙事具有解经的功能，即通过对历史真相的再现，以反观孔子对历史的叙述，从而探求孔子对历史的认识与评判。但《左传》叙事的意义并不局限于此。因为叙事者对事件的叙述表达本身就是一个解释的过程。叙事者在陈述一件事情之前，必须先有自己的理解和解释，按照这种理解和解释，对事件的原委始末进行交待，并影响其叙述方式和侧重点，从而使得“历史”与“过去”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葛兆光先生在其《思想史的写法》中就说：“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承认，无论是古代还是现

代，意识形态的压力、价值观与感情的好恶、思路与方法的偏好、时势与政治的需要、历史资料的缺失和残存的偶然性，虽然都无关‘过去’的事实，却都会影响‘历史’的叙述，不在场的阴影始终笼罩着在场的书写者，所以‘过去’与‘历史’的裂隙越来越大”。<sup>⑰</sup>

因此，《左传》中的叙事所构造的历史情境，必然隐藏了叙事者自身对于历史事件的认识与评判，从而影响了“历史”的面貌。《左传》的叙事所展现给阅读者的并不一定是真实的“过去”，很可能是左氏自己的“历史”。所以《左传》的叙事还有另外一个潜在的意义和功能，即表达左氏<sup>⑱</sup>自己对历史的认识与评判。

而所谓解经语，特别是“凡例”，则是通过对《春秋》书法的分析，以探求孔子对历史的认识与评判，也就是所谓的“微言大义”。于是在《左传》叙事与解经语之间，就存在两种不同的认识与评判。

当然，所谓孔子对历史的认识与评价，其实是三传以及后人对历史的认识与评价，因为孔子并未曾亲口告诉后人他的《春秋》大义，至少《论语》中并未提及孔子作《春秋》之事。比如就《春秋》弑君书法大义而言，《春秋》三传的意见就未曾统一过，各有各的理解。

《左传》认为“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sup>⑲</sup>《公羊》认为称名者乃大夫弑君之辞，“大夫弑君称名氏”；<sup>⑳</sup>称人者乃微贱者弑君，“贱者穷诸人”；<sup>㉑</sup>称国者乃众弑君之辞，“称国以弑者，众弑君之辞”。<sup>㉒</sup>

《谷梁》则认为称人者乃君之过也，“称人者，众辞，众之所同，则君过可知”，<sup>㉓</sup>称国者乃君恶已甚，“称国以弑其君，君恶甚矣”。<sup>㉔</sup>

此后的各家解经之说就更加意见分歧，如唐代陆淳认为：“君有道，则大臣称名，卑者称盗；君无道，则大臣称国，卑者称人。”<sup>㉕</sup>宋代孙复则认为：“大夫弑君则称名氏以诛之，……微者弑君，则称人以诛之，……众弑君则称国以诛之”。<sup>㉖</sup>

故从这一角度出发，也可认为《左传》解经语归根到底还是左氏自己对历史的认识与评判，它与《左传》之叙事并无本质差别。

就解经语而言，虽然后世学者解释《春秋》大义各有不同，甚至有人认为《春秋》无褒无贬，<sup>㉗</sup>但凡承认《春秋》有“微言大义”者，都公认孟子对《春秋》大义的解经，即“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

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sup>[14]#6</sup>也就是说,以往《春秋》学者大多承认,《春秋》有贬斥乱臣贼子、重整纲纪伦理的“大义”。于是历来对《春秋》大义的探求,大多围绕着《春秋》书法的“笔削褒贬”之义,即所谓“一字所嘉,有同华袞之赠;一言所黜,无异萧斧之诛”。<sup>[15]#</sup>这就极大地限定了各家所谓“《春秋》大义”的发挥空间。如《左传》弑君凡例,“凡弑君,称君,君无道;称臣,臣之罪”,或是追究君有无道之过,或是贬斥臣有弑君之罪,总是围绕着是非道德评判展开。

相对比之下,叙事的发挥空间就比较宽广了。因为“历史”作为一个阅读文本,它所提供的不仅仅限定于“《春秋》大义”,人们对历史往事的认识与评判完全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故以叙事这种方式解经所能发挥的空间远远超出凡例解经的范围。超出“春秋大义”的束缚,更多的表达叙事者自身地情感好恶。

从这个意义上看,可以认为《左传》叙事与解经语之间存在两种不同的认识与评判,即“左氏”与“孔子”<sup>[16]#</sup>的不同。徐中舒先生就认为,由于《左传》成书于战国时代,体现了战国时代的思想特征,从而与孔子的思想有所差异。而童书业先生根据《左传》所体现的学识观点,断定其人虽为儒家后学,却有少量早期法家思想,并于军事甚感兴趣,似长于兵家之学。<sup>[17]#</sup>

于是左氏在叙事中所体现的历史认识与评判就与这种预定的“《春秋》大义”发生了紧张关系,从而导致《左传》叙事与解经语之间的不相吻合,可以认为,《左传》叙事的双重意义可能是引发《左传》叙事与解经语之间不合的原因之一。

也正是因为《左传》叙事表达了左氏自己的思想,超出了所谓“春秋大义”的限定,所以《左传》叙事遭到后世许多学者的批评。如朱熹曾说:“左氏之病,是以成败论是非,而不本于义理之正。尝谓左氏是个滑头熟事、趋炎附势之人”;<sup>[18]#8+3</sup>“《左氏传》是个博记人做,只是以世俗见识断当它事,皆功利之说”;<sup>[19]#8+3</sup>“《左氏》是史学,……史学者,记得事却详,于道理上便差。”<sup>[20]#8+3</sup>宋代吕大圭也说:“左氏虽曰备事,而其间有不得其事之实。观其每述一事,必究其事之所由,深于情伪,熟于世故,往往论其成败而不论其是非,习于时世之所趋,而不明乎大义之所在。”<sup>[21]#1-69</sup>

随着《左传》叙事的思想遭到批评,《左传》叙事的可信度也受到怀疑和否定。因为叙事本身就是一种解释,叙事者总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来重述“过去”,他所展现的是他所理解的“过去”,“历史”总带有叙事者的烙印。更何况“所谓‘春秋笔法’与‘美刺说’,并没有把‘真实’当做它的终极追求,它把书写历史当做一种奖惩的权力,同时也把权力的认同当作奖惩的依据”。<sup>[22]#</sup>于是对《左传》叙事之“义”的不满,往往就会引起对《左传》“事”的怀疑和否定。宋代叶梦得就说:“左氏传事不传义,是以详于史而事未必实,以不知经故也。”<sup>[23]#1-69</sup>认为《左传》虽传《春秋》之事,但由于《左传》“不知经”,即不懂得《春秋》大义,所以《左传》对历史的叙述往往有谬误之处,即“事未必实”。

综上所述,由于《左传》叙事既有解释经义的功能,又有表达叙事者自身历史认识与评价的功能,超出了“春秋大义”的限定,从而导致《左传》叙事与解经语之间存在张力与不合,并使得《左传》叙事在后世义理的标准下遭到严厉批评和质疑。

#### 注释:

- ①参见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北平,朴社,民国22年(1933年)。
- ②参见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
- ③参见陈澧:《东塾读书记》卷10,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25年(1936年)。
- ④参见胡念貽:《〈左传〉的真伪和写作时代问题考辨》,《中国古代文学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0月,第21-76页。赵光贤:《〈左传〉编撰考》,《古史考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8月,第136-165页。
- ⑤参见胡念貽:《〈左传〉叙事的倾向性》,《先秦文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64-177页。
- ⑥参见杨向奎:《论〈左传〉之性质及其与〈国语〉之关系》,《绎史斋学术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第174-214页。
- ⑦参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3页。
- ⑧参见赵生群:《〈春秋〉经传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张素卿:《叙事与解释:〈左传〉经解研究》,台北,书林,1998年。
- ⑨此处“历史的叙事”与“虚构的叙事”是参考张素卿先生在《叙事与解释》中的术语。
- ⑩参考张素卿先生在《叙事与解释》中的术语。
- ⑪张素卿在《叙事与解释》一书中,为了突出《左传》叙事的传经意义,特别将《左传》“解释的叙事”与“历史的叙事”、“虚构的叙事”对立区分起来,我们觉得有些不妥,毕竟前者指

向叙事的功能,后二者是指向叙事的内容,不属于同一个层面。

- ⑫关于《左传》的作者是否为左丘明还存在很多争论,本文此处仍然沿用传统说法,以指代叙事者,便于行文。
- ⑬郑樵曰:“以《春秋》为褒贬者,乱《春秋》者也。”转引自朱彝尊:《经义考》卷 168,北京,中华书局,1998 年,第 870 页。
- ⑭现在很多学者认为孔子并未作《春秋》,也否认《春秋》中有微言大义,本文暂不讨论这些问题。此处沿用传统说法,以“孔子”之义与“左氏”之义相对比,主要是行文需要,便于区别理解。
- ⑮参考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

参考文献:

- [1](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3.
- [2](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3](宋)胡安国.胡氏春秋传[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 [4]赵伯雄.春秋学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
- [5]张兼卿.叙事与解释:左传经解研究[M].台北:书林,1998.
- [6](唐)陆淳.春秋集传纂例[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 [7]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 [8]孙绿怡.左传与中国古典小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 [9]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 [10](唐)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11](唐)杨士勋.春秋谷梁传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12](唐)陆淳.春秋集传纂例[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 [13](宋)孙复.春秋尊王发微[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 [14](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5](宋)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16](清)朱彝尊.经义考[M].北京:中华书局,1998.

责任编辑:曲晓红

## Disagreement between Zuo Zhuan Narration and Its Interpretation of Chun Qiu—Causes and Effects

Wu Bingkun

(Center of Hui Culture Studies, Huangshan University, Huangshan245041, China)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many controversies have been raised about Zuo Zhuan, such as its writer, authenticity, timing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another history book Chun Qiu, among which the disagreement between Zuo Zhuan narration and its interpretation of Chun Qiu is most appealing due to its high correlation with the unsolved academic debate whether or not Zuo Zhuan is an interpretation of Chun Qiu.. Based on the objective textual study of Zuo Zhuan,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such a disagreement may come from the functional duality of Zuo Zhuan narration, namely interpretation of Chun Qiu and narrator's own critique of history.

**Key words:** Chun Qiu; Zuo Zhuan; narration; interpretation of Chun Qiu

·徽州文化小资料·

### 明清两代徽州的举人、进士、状元

明清时期,徽州人才辈出,科第连绵。根据地方志记载统计,明代徽州有举人 1100 多人,清代有 1536 人。明代徽州进士 452 人,居全国第 13 位;清代徽州进士 684 人,居全国第 4 位。明代徽州状元为 3 人。而清代 112 科 112 名状元中,徽州本籍状元 4 人,寄籍状元 15 名,共 19 人,占全国的 17%,居全国第一位(原被认为状元数最多的苏州府共有状元 24 人,但其中有 6 人为徽州人)。此外,歙县明清两代共取进士 623 人,居安徽省诸县首位。